

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人文性思考

陈忠平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基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分析, 指出大纲在语言技能和文化素养教学要求上的不平衡性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盲目的学生需求分析对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影响, 制约了教材编写中人文性的彰显; 针对当前英语教材人文性欠缺的问题, 解读了人文性的内涵, 提出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增强人文教育核心内容, 民国时期一大学英文课本《大学英文选》的选材起点高, 视野广, 人文性强, 语言典范性突出编写特点, 对当前英语专业教材编写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英语教材编写; 培养目标; 学生需求; 人文性; 《大学英文选》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5-0054-04

近年来, 英语本科专业教材的编写出版不断繁荣, 各类教材推陈出新,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教学的新思路, 也丰富了教材使用的选择。但是, 在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呼吁英语专业回归人文学科本位的背景下, 英语专业教材尤其是综合英语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充分彰显专业人文性却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已成为国内英语教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专业学生最基本的学习工具和核心材料, 而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各种目标要求编写教材, 其选材取向直接关系到《大纲》规定的各种语言知识、技能、人文素养等目标能否实现, 需要外语教育工作者认真探究。在已有的研究中, 文秋芳提出了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三大原则^[1]。庄智象则指出现有英语专业教材中对人文科学和文化重视不够的倾向^[2]。这些论述, 阐明了当前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包孕了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对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具有较普遍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分析《大纲》教学要求的不平衡性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盲目的需求分析给编写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以一本民国时期编写的英语教材为例阐述英语教育人文性内涵如何体现在教材编写选材中。

一、教材编写的依据及相关问题

(一) 教学大纲

《大纲》开篇指出, 《大纲》所作的各项规定是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依据。这要求《大纲》确定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必须在教材编写中予以体

现。《大纲》确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复合型英语人才”, 学生“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3](1)}。客观而言, 这样的目标描述是比较全面的。

就具体的教学要求来说, 《大纲》对各类专业技能如语音、语法、词汇、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等又按级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里不一一列举。但是在文化素养方面, 《大纲》仅要求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 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 熟悉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具有较多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 具有较强的汉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3](1)}。比较《大纲》专业技能与文化素养的教学要求, 可以发现它们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前者条目清晰, 层级分明; 后者则笼统含糊。《大纲》仅指出学生在四年学习中要熟悉英语国家的概况, 学习较多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 培养较强的创新意识, 至于“文化传统”“人文知识”等究竟要包括哪些层面的内容, 《大纲》则语焉不详。从开设课程来看, 专业技能课程类型丰富, 学时较长, 体现人文素养的课程除了文学、英美国家概况等少数课程外多数被列入选修课, 而通观此类课程的教材, 内容往往多介绍说明, 少思辨分析,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诚然, 关乎语言本体的知识和技能, 在教材编写中须充分关注, 但目前的问题在于, 我们过多关

注语言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对人文科学和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教学要求上的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纲》较高层次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因此不容忽视。此外,从教材编写者角度来说,依照《大纲》描述的语言本体结构特点进行选材编写,方便按部就班,易于操作。相反,要将文化素养这些高层次目标内容全面落实在编写中,则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编者自身视野开阔,人文素养深厚,语言功底扎实,这样在选材时方可博采人文精华,集成学习精品。

毫无疑问,包括教材编写者在内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在这一问题上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编写者在选材编写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兼顾基本功、知识面、能力及素质各个方面,做好各阶段各方面统筹考虑,在选材上要既重视语言技能训练又认真挖掘较系统的人文科学素材,力争每篇选材“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帮助实现技能训练融入文化教学,实现《大纲》规定的各级培养目标。相反,若编者畏难怕苦而避重就轻,或缘于自身学养所限缺乏甄别眼光,则无法汲取真正的人文精髓,仅会炮制一些新的大众读物,其结果也必然是昙花一现,不能成为教材精品。

(二) 学生需求

教材编写除了符合教学大纲的目标和要求以外,还应考虑教材使用者(主要是学习者)的需求,是否考虑这种需求也已成为教材评价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坎宁斯沃思列出的教材评估指导意见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教材应与学习者需求相符合^{[4](15)}。英国语言学家哈默也指出,在评价一本教材时应尽力包括学生的意见,考虑学生的需求^{[5](301)}。国内研究者也积极探索教材与学习者需求之间的关系,如钱瑗提出编者“在选择课时应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和兴趣”^[6]。程晓堂认为“无论是分析或评价教材,还是编写教材,都要考虑教材使用者的需求”^[7]。在具体的需求分类上,Masuhara 将学生需求分为三个类别:个人需求、学习需求与就业需求^[8],涉及学生文化背景、学习风格、学习目标、就业前景等诸多方面。这些论述表明,学生的语言学习需求已成为教材评估的一个重要项目,同时也成为教材编写的一项重要依据。

需求分析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需求,对于教材编写过程中的选材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值得英语教材编写者认真考虑。但是编写者同时也要看到,将目标需求简单地与就业联系起来编写教材,对于短期语言培训也许适用,但对于

大学的英语专业而言,则需要慎重考虑。我们的英语本科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培训学校,其社会性质决定了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必须负载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也因此决定了《大纲》确定的培养目标不能仅局限于语言技能的传授。国内一些关于教材与学习者需求的研究者如周雪林等,多强调教材要满足学习者的需求,要求增强教材趣味性、娱乐性和实用性^[9],而对教材应体现的个体需求之外的社会需求重视不够,这一倾向值得编写者注意。实际上,本科英语教育应重在语言基础之上扩展兴趣,陶冶情操,提升品格,这就决定了教材不能一味迎合学生趣味而偏向通俗实用的素材。编写者在选材时对学生的情趣宜注重裁节拔高,要推动学生从趣味通俗走向格调高雅,从浅薄了解走向深度探索,激励学生开阔视野,志存高远,所选素材要能满足学生知识不断增长的需求,要与专业学习阶段和人生发展相适应。也就是说,要将学习者的当前需求与未来需求、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有机融入到教材选材中。

二、英语专业人文性内涵及其在教材编写中的实现

《大纲》中关于英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表明了英语本科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性质。说到人文,《易经》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0](132)}意思是说,了解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教化天下。这种解释,与《学记》中所说的知类通达,化民易俗是相通的,可称真正的大学之道。我国前辈学人对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也早有论述。蔡元培认为教育为:“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11](407)}在他看来,教育是培养崇高理想,完善国民人格,“事关国家的隆盛”的大事,不能仅停留在知识技能上。朱光潜则指出,大学教育“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12](15-19)}。从这些论述来看,英语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虽有一定专业化程度,但同样应坚守人文通识教育这些理念,要在传授英语知识技能的同时,努力培养高尚的品格情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我国老一辈的英语教育家对英语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也有过清晰的表述。许国璋曾说:“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

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13](3-4)}胡文仲则大声呼吁外语专业应积极贯彻人文通识教育,否则将来高水平的研究者、翻译家、外交家、大学教授则无从谈起^{[14](序言)}。这些观点,在大学教育日益实利化的今天,尚需学界有识之士大力弘扬和实践,无论从课程设置,亦或教材编写,还是课堂教学,都需要向人文通识回归,否则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专己守残之陋见”根本无法打破,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只能是凭空奢谈。

对于人文素养的重要性,目前已集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为什么目前许多英语教材还是没有体现足够的人文性呢?除了第一部分所列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存在一个如何理解人文性内涵的问题。“人文”一词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旧指诗书礼乐等。……今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15](1399)}实际上,今天我们用“人文”一词来指各种文化现象时,其内容已变得非常广博,而且仅就文化来说,也会有不同的定义和分类。文化可以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16](1)},也可以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17](200-204)}。严格说来,人文科学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其内涵从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扩展到广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不同门类学科,这些学科可以视为现代人文通识教育的主体内容。纽曼所主张的大学要探索的普遍学问^{[18](19-20)},也大体如此。现在回顾解放前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外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19](225-241)},可以发现此类课程始终贯穿大学学习,呈现出浓厚的人文气息。当前一些教育专家如张汝伦等呼吁进行以文史哲教育为核心的人文通识教育^{[20](12-18)},实际是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人文教育传统。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仍大有作为,教材编写者也享有广阔的编写选材空间和宝贵的前人经验,而要改变英语专业教材人文性薄弱的局面,编写者应首先在编写选材环节上开阔视野,细心甄别,应尽量吸纳人文通识教育核心内容,突出中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重点关注不同文化中的制度和精神文化,突出深层的价值观,要避免那种舍本求末,重物质文化轻观念价值,重通俗文化轻核心观念的浅薄娱乐取向。这样选材,也许更利于让学生在体悟不同文化观念价值之时做到知类通达,感受人类文明的多种创造和发展

的可能性,又可于不同思想机锋交织之间去审思切问,提升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民国时期英文教材《大学英文选》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的教材编写取向,下文将简要分析一本民国时期编写的英文教材编写思路,供我们学习借鉴。该教材名为《大学英文选》,由当时教育部任命的英语教材编委会为大学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编写。编委会由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范存忠、李儒勉及林天兰组成,1939年开始编写,历时一年完成初稿。初稿经各国立大学试用两年,再由编委会根据各种试用意见修改调整后定稿。就编者而言,委员会各位成员均是中西兼通,学养深厚的大家,今天国内的英语教材在这一点上恐怕已是无法媲美。

下面我们从选材作者、题材、语言等方面对《大学英文选》(以下简称《文选》)进行分析。首先《文选》收录了不同学科方向的篇目,从源头上保证了该教材的人文通识性。一般英文教材多偏重选择文学类作家,但是《文选》选材不拘一格,作者类别多样,有哥尔史密斯、奥斯丁、狄更斯、哈代、曼斯菲尔德、史蒂文森、麦考利、毛姆等文学大师,有纽曼等教育家,还有哲学家罗素、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著名报人艾迪生和斯梯尔等等。《文选》还特别收录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作品《建国方略》,可谓独具匠心。可以说,《文选》佳作荟萃,其题材从政治法律教育到普通百姓生活,从社会变革到父子人伦,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中西兼顾,既论人生大义,也谈世间苦乐,为学习者提供了观察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多种视角,体现了编者深厚的人文情怀。

好的语文教材,语言典范性至关重要。《文选》多选大家名篇,无论是状物写人,还是记叙说明,都是英语语言艺术的典范之作,值得学习者潜心诵读,习作模拟。其中的一些篇目如史蒂文森的《我怎样练习写作》,赫胥黎的《自传》,罗素的《中国人的个性》,克拉克的《假如我再当一回新生》,比尔博姆的《说送别》,兰姆的《梦幻中的孩子》等,已成为今天各类散文选集的经典篇目。

《文选》还有一些特点值得讨论。例如,《文选》前三部分所有篇目均按记叙、描写和说明三种体裁分别编排,可谓独树一帜。其次,在语言难度上,《文选》在当年是供非英语专业一年级新生学习,而今诸多篇目却是供英语本科专业高年级或研究生阶段学习,其难易之别,值得英语教育工作者反思。

总结起来,《文选》作为一本综合英语教材,其选材起点高,视野广,人文性强,语言典范性突出,有许多供今天同类教材编写者借鉴学习的地方。

四、结语

为英语专业学生编写教材,事关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英语教育工作者认真谋划。我们认为选材可适当考虑学生学习兴趣,但不能迁就随性;可适当考虑社会变迁,但不能随波逐流,教材应重视梳理探究中西方社会文化主流的思想价值观,避免偏狭片面的选材。选材要起到移情游志的积极推动作用,要着眼于培养具有高尚情操,开阔视野和批判思维的谙熟中西文化核心理念的双语人才。现在人文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英语专业教育中已逐渐受到重视,有高校不满足以一门两门课程来增强人文教育,而是采用“课程板块”的做法来系统提升英语教育的人文性^[21],这些实践,必将带来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新高潮。本文的撰写,就是希望能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关注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问题。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重要原则[J].外语界, 2002(1): 17-21.
- [2] 庄智象.关于英语专业本科生教材建设的一点思考[J].外语界, 2005(3): 49-56.
- [3]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4] Cunningsworth A.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M]. Oxford: Heinemann, 1995.
- [5] Harmer J.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London: Longman Group, 2001.
- [6] 钱瑗.介绍一份教材评估一览表[J].外语界, 1995(1): 17-19.
- [7] 程晓堂.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35.
- [8] Masuhara H. What do teachers really want from coursebooks?[C]// B. Tomlinson.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周雪林.浅谈外语教材评估标准[J].外语界, 1996(2): 60-62.
- [10]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1]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2] 朱光潜.文学院[C]//杨东平.大学精神.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 [13] 许国璋.英语教育非英语教学[C]//《英语学习》编辑部.英语的门槛有多高.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4] 胡文仲.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15] 夏征农.辞海[Z].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 [16]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2.
- [18] Newman, J.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31.
- [19] 李良佑, 张日昇, 刘犁.中国英语教育史[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 [20] 张汝伦.我国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出路[C]//孙有中.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21] 金利民.注重人文内涵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3): 176-183.

[编辑: 颜关明]